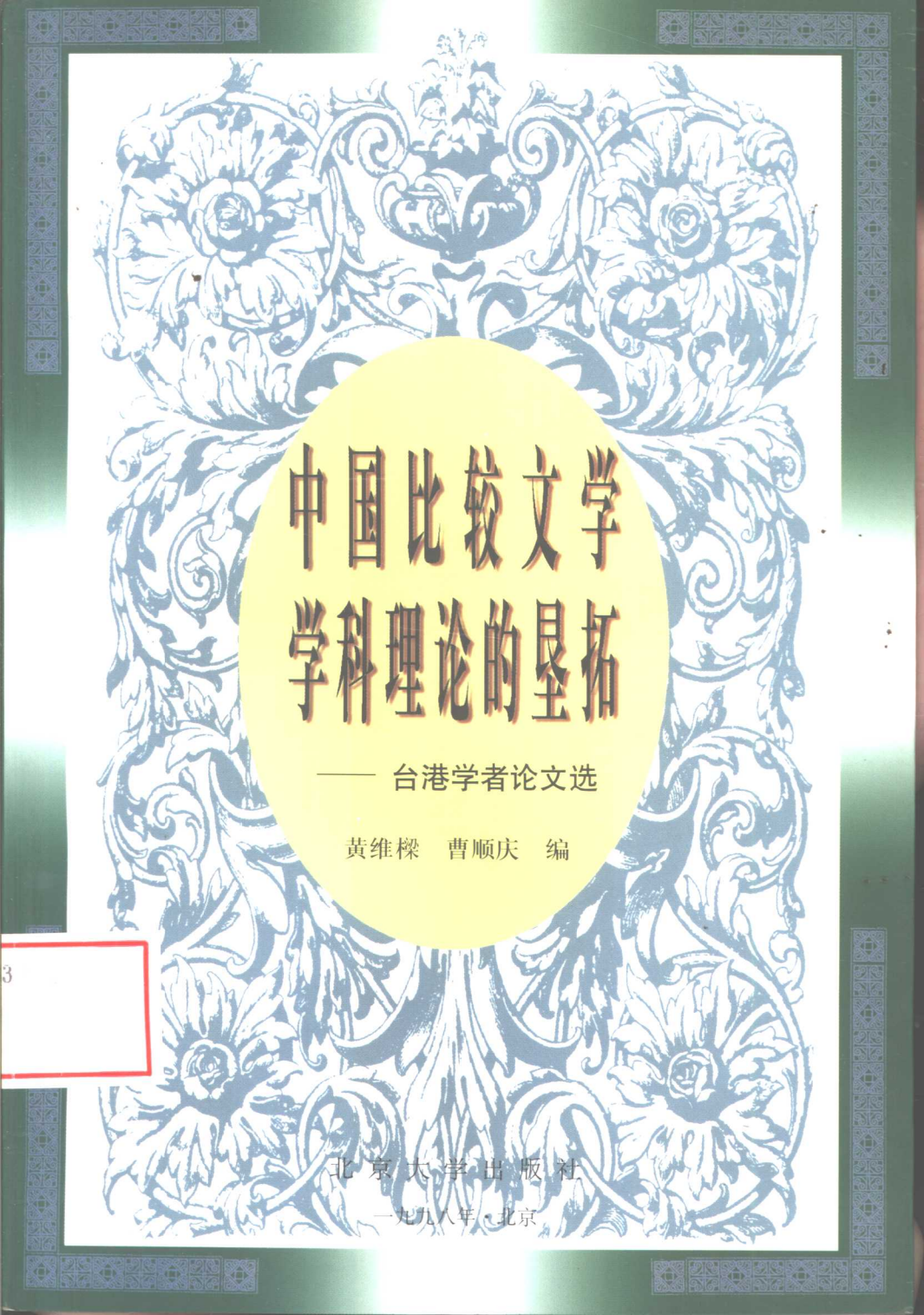




中国比较文学 学科理论的垦拓

—— 台港学者论文选

黄维樑 曹顺庆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黄维樑、曹顺庆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ISBN 7-301-03606-X

I. 中… II. ①黄…②曹… III. 比较文学-文集 IV. I0-03

书 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

著作责任者：黄维樑、曹顺庆 编

标准书号：ISBN 7-301-03606-X/I·458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大32开本 9.25印张 245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6.00元

封面设计：鹿耀世

目 录

序	黄维樑 (1)
导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	曹顺庆 (5)

中西文学比较

余光中	中西文学之比较	(21)
李达三	比较的思维习惯	(34)
袁鹤翔	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	(54)
叶维廉	寻求跨越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	(83)
张汉良	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与范畴	(96)
苏其康	中西比较文学的内省	(115)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李达三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139)
陈鹏翔	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步骤	(144)
古添洪	中国学派与台湾比较文学界的当前走向	(163)
附录：1.	《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节选）	(178)
2.	“比较文学中国化”座谈会记录	(179)
3.	究竟是谁最先敲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锣鼓？	(183)

阐发研究

- 周英雄 结构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研究? (185)
- 黄维樑 《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
——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 (203)
- 颜元叔 析《春望》 (218)
- 陈炳良 《九歌》的悲剧视像 (223)

类比研究

- 张静二 比较文学中的类比研究 (231)
- 李有成 为什么比较?
——中西比较文学中的类比研究初探 (245)

影响研究及其它

- 钟 玲 美国诗人如何看待中国诗学 (256)
- 刘绍铭 英美文学批评家笔下的中国小说 (270)
- 夏志清 钱钟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 (280)

序

黄维樑

观察人生世相,离不开比较:“满招损,谦受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事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的析评,也离不开比较:李白飘逸,杜甫沉郁;唐诗如酒,宋词如荼。19世纪末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大量接触西方文学,周桂笙和林纾,都一边阅读,一边比较:中国小说和法国小说之起笔有何不同?狄更斯和司马迁的文笔,谁更超卓?^① 比较不必等待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从西方传进来,中国学者已迫不及待地从事“非正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了。蒋梦麟在《西湖》中说:“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中西的比较。哈佛大学的雷文(Harry Levin)教授有文章题为“What Is Literature If Not Comparative?”诚然,文学如果不是比较的,是什么?

比较文学研究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剖析比较其异同,或追寻其相互影响的轨迹。前者是类比研究,后者是影响研究。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20世纪登陆中国之后,甚有发展。一来基于认知上的好奇,二来基于探讨中西文化异同优劣的兴趣。到了50、6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内地沉寂下来;80年代复兴,自此兴旺发达,取得了累累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在内地沉寂之时,台湾和香港却兴起且发展起来。在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深造的

① 可参看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章。

陈颖教授,大概是首位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后有刘绍铭教授等人。余光中教授1967年撰写的《中西文学的比较》,是台湾早期比较文学论述的一篇重要论文。余文收于本书。陈氏的论文《李贺与济慈》,则因为用英文写成,而不能摘取其章节编入,相当可惜。30年来,台湾的比较文学研究,迭创佳绩,李达三(John Deeney)教授已屡屡为文,为专著作回顾与总结。近年海峡两岸和香港出版了若干比较文学论文集,展示了这方面的成果。

1996年夏天,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来港访问、研究。顺庆兄博闻强记,全情投入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在中文大学校园经常见面,倾谈之下,认为应该编辑一本台湾比较文学论文集。与曹兄居于同一宾馆的北大出版社乔征胜先生,鼓励我们说:北大可考虑出版此书。征胜兄处事认真信实,他的话使我们欣喜。中文大学是香港甚至港、台比较文学的重要基地。德国的海德堡和日本的京都,都有“哲学家之径”。在我看来,中文大学的山村路、中央道、士林路可连成一线,谓之“比较文学家之径”。香港的、台湾的、内地的,其他地方的比较学者,在这条路上行走,或上学或回家,或前往参加研讨会或回宾馆休息,他们在山径上沉思冥想,柳暗花明,涉及的常常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李达三、袁鹤翔、周英雄、朱立民、钟玲、陈慧桦、乐黛云、刘介民、曹顺庆、张隆溪、雷文、奥椎基(A. Owen Aldridge)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比较文学的足迹和思维。现在把其中一些台湾学者的论文编选成书,工作进行时,他们的高谈谈论好像在吐露港之滨又一次响起来了。

顺庆兄初步拟订篇目,我们一起商量,经过斟酌损益,成为目前的式样。我们力求多方面兼顾,选出重要的论文。由于篇幅有限,加上其他原因,遗漏是在所不免的。特别要提的是,书中有一辑名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反映了对一个争议性论题的意见。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严重入超。究竟中国先贤有值得发扬的优良国粹吗?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应发扬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应创造

性地发扬些什么?“中国学派”关注的,正是发出中国声音这个大问题。也许“中国学派”这个提法仍可斟酌,它的内涵却是我们今后应该探讨的重要课题。《文心雕龙》是公认的文论宝典,作为“龙”的传人,我们能创造性地传扬些什么?

20年前,一位任职于诺贝尔委员会的瑞典作家,在一篇文章里说:“学院经常……被指责为忽略亚洲、非洲和其他偏远地区的文学。但我怀疑那里是否有那么多值得去发掘的。”^①对东方文学有这样的偏见,对东方文论亦然。幸好一些西方学者如迈纳(Earl Miner)已较为公平地向东看;顺庆兄主编的《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更以具体例证说明“东方不败”。1942年,钱钟书先生比较中西诗学文论,已发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则以排山倒海的实例,来说明这一观点。东西方文化多共通之处,东西方文学文论各具价值。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倍地努力,指陈东西方的异同,更雄辩地维护、发扬中国的价值,发出中国的声音,以期在“多元文化”的全球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位。

占一席位是与民族文化尊严攸关的事,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应提倡狭窄的民族主义,更不表示在鼓吹民族自大狂。刘勰说的“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永远应奉为我们的座右铭。博观中西文学的夏志清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文人多半明哲保身,没有勇气向专制政治、不义社会、丑陋风俗宣战;文学作品没有表现这样的抗争精神;如果历代文人不这样明哲保身,则中国文学作品的内容会比我们现在读到的丰富得多。特别让夏教授感动的、钦佩的,是那些悲天

① 引自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教授的一篇讲词《瑞典学院与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译刊于台北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7年3月号。

恼人的西方小说,如俄国的《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① 这是一位华人学者对中华文化的反省,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大论题。这也可引发我们的讨论:究竟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抗争精神如何? 是否有怎样的民族文化,就有怎样的文学? 究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同的多呢? 相异的多呢?

余光中先生认为,一般学者论述中西文学,“恐怕都只是管中窥豹,甚至盲人摸象而已”;博学的钱钟书先生,谦逊地把他的比较文学巨著命名为《管锥编》。钱先生尚且如此,我们面对全球文学、文化的汪洋大海,自然更应谦逊。

台、港的学者在此书献上一些研究的成果。谦逊可使我们更努力——“满招损,谦受益”。不论在哪个地区,中国学者当会继续努力比较中西文学的异同,探讨中西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尝试在国际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比较文学学者比一般的文学学者涉猎得更广,懂得更多的语言(至少理论上如此),然后才能旁征博采、纵横论述,得天下之文学而比较之。比较文学是十分有意义、十二分不容易的学科,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谦逊地努力,接受挑战。

一九九七年八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黄维樑,1947年出生,广东澄海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级荣誉学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1976年起至今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为中文系教授,曾兼新亚书院通识学部主任。教学和研究以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为主。著作颇多,包括《中国诗学纵横论》、《中国文学纵横论》、《怎样读新诗》、《香港文学初探》、《古诗今读》、《中国古典文论新探》等多种论著;曾编著书籍多册,另有三本散文集行世。

① 夏氏意见详阅“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一文,此文刊于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88年出版的那一期。

导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

曹顺庆

比较文学在我国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全国学界关注的热门学科。世纪之交,随着不同文明圈的文化差异与冲突日益明显,比较文学将进一步肩负起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沟通、促进世界文学交流的重任,也必然受到学界的进一步重视,其学术地位日益重要。在我国,比较文学的重要性已引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国家教委的高度重视,在最近的一次学科点调整中,在大幅度压缩二级学科的情况下,却将比较文学列为中国语言文学八个二级学科点中的一个,并将“世界文学”学科点与“比较文学”学科相结合,以加强比较文学学科建设。

由于这一新调整,比较文学必将以一门正规学科在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迈出新的步伐。然而,由于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时间不长,学科理论建设非常薄弱,无法适应当前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之迫切需求,鉴于此,我们选编了这本《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星拓——台港学者论文选》,意在借鉴和总结台港学者的研究成果,清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路径,以促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适应当前教学研究之迫切需求。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做一点基础性、资料性的准备工作,以适应比较文学发展的新形势。

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

其特点在于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界的一步步拓展。好比投一块石子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一圈圈荡漾开去,但无论有多少个圈子,中心却是稳定的,即始终稳稳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不同的圈子构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所有的圈子便共同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个圈子,是法国学派所确立的学科理论。法国学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巴登斯贝格(1871—1958),他在《比较文学的名与实》一文中,对比较文学的理论作了扼要阐述,认为布吕纳季耶的进化论观点已过时,那种机械地寻找不同文学类型之间因果关系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平行研究。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阐述法国学派观点的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1931)。梵·第根将比较文学作了如下界定:第一,将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认为“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之间的‘二元的’关系”。只是对“一个放送者和一个接受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之证实”。而“总体文学”则是“对于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实事的探讨”。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区别开,实际上是缩小了圈子,将“比较文学”仅仅限制在一国对一国“二元的”事实关系的研究。第二,梵·第根强调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沿着“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这条路线去追溯其影响关系,尽可能搜集材料;而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局限于实证而忽略了对文学特征即“文学性”的分析,甚至公然主张“‘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实际上又进一步缩小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包围圈。第三,以欧洲为中心来讨论比较文学的性质和任务,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就是研究欧洲诸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努力将各国文学归附到欧洲文学之总体的历史中去。这就将歌德等人提倡的“世界文学”缩小为欧洲文学,以后则沦为“法国中心”的文化扩张主义。以上三点“人为的限制”,确立了“法国学派”的宗

旨和特征,形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个圈子。

法国学者们并不就此罢休,在梵·第根之后,他们又进一步缩小包围圈,卡雷与基亚力图使“圈子”“精确化”。卡雷于1936年接替巴登斯贝格任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后,便致力于使比较文学概念“精确化”的工作。他在为他的学生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比较文学的概念应再度精确化。我们不应无论什么东西、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乱比一通。……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这里已经见不到梵·第根的“总体文学”的论点,强调的仅仅是实证主义的事实联系,将比较文学紧紧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正是这种使学科精确化的努力,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危机。因为比较文学的初衷是打破各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将文学视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推动世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结果恰恰相反,“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将比较文学仅仅视作文学的外贸,甚至使比较文学沦为民族文化沙文主义的工具,并极力反对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显然,这种“理论”,已经蜕化为比较文学进一步发展的“紧箍咒”。不冲破这一个“圈子”,比较文学领域当然只能变成死水一潭。

历史任务,落到了美国学者的肩上。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上,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对法国学派的“定义”提出了大胆的挑战。韦勒克首先攻击的便是桎梏比较文学向前发展的“圈子”——人为的界线。他指出:“在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构筑一道人造的藩篱,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文学。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这一愿望,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在内容方面变得鸡零狗碎,既不连贯,相互之间又毫无关系,仅仅成为与总体相割裂的交互关系网,只能研究二流作家,研究翻译、游记和“媒介物”。总之,这种人为的限制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是研究国外渊源和

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正是这种限制,使比较文学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在方法和方法论方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韦勒克主张废除内容与方法的人为界线;摒弃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铲除民族主义的,与比较文学精神相违背的为本国文学评功摆好的文化扩张主义,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主张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比较文学应当回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洪流中去。韦勒克指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当废除,文学‘比较’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研究。”韦勒克力图冲破“圈子”的观点,在比较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搅活了这潭“死水”,给这门学科带来了新的生机。众所公认的“美国学派”由此诞生了!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派确立了自己的学科理论,倡导无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在学科理论建设中,雷马克与威斯坦因等人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学科理论体系。雷马克指出:“比较文学研究超越一国的文学,并研究文学与其它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和其它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几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它领域相比较。”(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雷马克的这个定义因仍有“人为的限制”,而受到了韦勒克的批评,^①但却因圈子太大而受到了来自另一面的批评,威斯坦因认为:“我们为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在领域的力量。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是不够的,而是太大了。”^②威斯坦因不但要缩小雷马克已经画出的“圈子”,而且力图将“圈子”限制在西方文学以内。因此他反对东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②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2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西方文学的平行比较，“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延续。这种企图将东西方文学平行比较排斥在比较文学研究之外的“人为的限制”，实际上代表了西方相当一批人的看法。而这，恰恰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又一个“圈子”，是束缚比较文学向前迈进的又一个新障碍。显然，必须冲破这一个新的圈子，比较文学才能够重新大踏步地前进。

自本世纪 70 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做出了实绩，并开始大胆地冲击这一圈子。台港学者所提出并倡导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是冲破这一圈子的大胆宣言。所谓“中国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打破“西方中心”的观念，倡导东西方文学的平等对话和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跨越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研究”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①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

① 参见《中国比较文学》1995 年第 1 期《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

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

什么是“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为什么说“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呢?

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雷马克曾对比较文学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国别文学是墙内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越出了围墙,而总体文学则居于围墙之上。”^①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围墙”比喻,那么可以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已经跨越了两堵“墙”,第一堵是跨越国家界线的墙,第二堵是跨越学科界线的墙;而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跨越这堵墙,创建比较文学又一个新学派,开创比较文学又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这第三堵墙的跨越,并非闭门臆测或杜撰,而是整个比较文学发展趋势使然。从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浸透,对话与沟通,乃至重建文学观念,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我在《比较文学史·序》中曾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事实,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这种跨越围墙之际产生的。而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也正诞生在这东西方异质文化跨越之际。台港学者在这一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创见。例如:叶维廉教授提出的东西方不同文化“模子”的运用及文化寻根探源的方法;李达三、陈鹏翔、古添洪等教授提出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化阐发研究;袁鹤翔教授提出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以及张汉良、张静二等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中国化”及类比研究等等,还有众多台港学者如周英雄、黄维樑、余光中等人的杰出研究,都极大地促进了比较

^①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参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乐黛云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无疑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第三阶段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① 近年来中国台港学者及大陆学者，以其丰硕的成果作出了令人欣慰的回答。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将比较文学推向又一个高潮，并在这跨越之中创立比较文学的又一新学派这一历史重任，似乎已经担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肩上。

或许有人担心，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会不会在“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比较文学安身立命之处在于“跨越”，即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之间寻求沟通、对比与跨越，而不是去占领其他学科领域，它始终跨在边缘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探讨这种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碰撞、文化浸透、文学误读，并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汇通、整合与重建。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这种“跨文化研究”特征的确立是对中国比较文学丰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与法国学派及美国学派皆大不相同，中国比较文学不是从学院中产生，更不是在纯学术的论战中发展。中国比较文学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从它呱呱坠地之日起，便带着中西文化碰撞的胎记。她的发展，是伴随着救亡图存，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改良运动而发展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比较意识，不是法国式的文学沙文主义（或曰法国中心），也不是美国式的“世界主

^① 参见《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义”,^① 而是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焦虑,是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企求。无论是文化上的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无论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反映了文化碰撞的焦虑心态和“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即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迫切愿望。中国比较文学,正是这种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正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交汇的激流中崛起的一支文化生力军,一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寻求中西文学互释、互照、互补、沟通、融会乃至重构文学观念的“架桥”大队。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法国式的文化“外贸”,不是文学作品“输出”与“输入”的斤斤计较;也不是美国式的文化“大同”,^② 不是强调“警惕民族特色”、主张“非民族化”的西方中心式的“世界主义”,^③ 而是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础和基本特色是“跨文化研究”,是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浸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经过台港学者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近十余年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的复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及其方法论体系,兹简略勾勒如下。

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

① 聂乌帕科斯娃之论,参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6 页。

② 参见威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等文,中译本参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③ 参见佛克玛《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批评:国际的观点》,中译本见《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并参见聂乌帕科斯娃的论文(同前)。